



我们心中的

任建意

中华书局



《我们心中的任继愈》编委会 编

我们心中的

任继愈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心中的任继愈 / 《我们心中的任继愈》编委会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4
ISBN 978 - 7 - 101 - 07290 - 7

I. 我… II. 我… III. 任继愈 (1916 ~ 2009) —
纪念文集 IV. K82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9912 号

书 名 我们心中的任继愈
编 者 《我们心中的任继愈》编委会
责任编辑 石 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 1/4 插页 10 字数 44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290 - 7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汝 信:深切怀念任继愈同志(代序)	1
-------------------------	---

北大学友、学生篇

黄枬森、刘 苏:由衷的敬仰 永久的怀念 ——我们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5
张岂之:略论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唯物史观	9
汪子嵩: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与任公交往六十年	18
阎 韬:纪念任先生	31
韩 敬:任继愈先生教我学习中国哲学史	34
许抗生:任先生教我做学问	39
金春峰:怀念任继愈先生	41
白化文:追随任又之(继愈)先生的一些回忆	45
程静宇:怀念恩师任继愈先生	54
附汪学群:一次难忘的谈话 ——怀念任继愈先生	58

宗教所同事篇

杜继文:追思任继愈先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	63
金宜久:深切怀念任公继愈先生	74
于本源:让任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发扬光大	81
乐 峰:任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人 ——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	83
卓新平:任继愈先生与我的学术生涯	85
张新鹰:“没有什么比事业更重要”	88
杨雅彬:我跟任先生学针灸	94
钟肇鹏:回忆任继愈先生	98

张伟达:我记忆中的任继愈先生	102
段 琦:任继愈先生引领我走进了宗教研究领域	106
魏道儒:终生难忘的一些事	
——追思任继愈先生	111
黄 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纪念任继愈先生	115

宗教所学生篇

李 申:我的导师任继愈	122
方广钊:任继愈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131
赖永海:一代宗师,千古风范	
——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	144
业露华:我心中的任继愈老师	148
李明友:追忆任继愈先生	151
玛 亚:中国哲学及其成为新理念的潜质	154
秦惠彬:天亦流泪	161
龚学增:念恩师·牢记关怀·不忘教诲	163
郭瑞祥:终生难忘的几件小事	166
潘桂明:生命不息,求真不已	
——一代宗师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精神	168
宋立道:缅怀我的恩师任继愈先生	
——写在7月17日遗体告别会上	173
何光沪:三件小事见师心	185
鲍希福:缅怀任继愈先生	188
王建平:平凡处见伟大	
——对导师任先生的点滴回忆	193
黄燕生:怀念任先生	197
吕建福:一代宗师教诲 学术生命源泉	
——深切怀念任继愈先生	200
崔正森:缅怀导师任继愈先生	207
吕有祥:感念任继愈先生	213

中哲史界同仁篇

方克立:我所认识的任继愈先生	215
----------------------	-----

张立文:珍惜时间,就是珍惜学术生命	
——沉痛缅怀任公	227
蔡方鹿:哲人仙逝 教诲永存	231
杨 坚:典型未远,风范长存	
——悼念任继愈先生	234
张西平:展现中国文化的意义	
——一代学术宗师任继愈先生与海外汉学研究	239

大藏经编委篇

葛维钧:琐忆与断想	
——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246
温玉成:牡丹时节动洛都	251
洪修平:哲人驾鹤去,学问满人间	
——怀念任继愈先生	253
王亚荣:微尘拂不尽,霁月浩当空	
——感怀任继愈先生	257
董 平:光风霁月的记忆	261
徐孙铭:润物无声暖心田	
——怀念任公继愈先生	265
何孝荣:任继愈先生的三封来信	269

无神论学会同仁篇

习五一: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追思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274
加润国:搞宗教研究我们最推崇任继愈先生	278
何祚庥:一位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大家	282
段启明:无神论兴衰与国家民族兴衰相联系	
——任继愈先生对无神论教育寄予厚望	284
陈祖甲:一生弘扬无神论的先驱	
——追思任继愈先生	288
文有仁:大家风范 平民风度	
——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	290

友 人 篇

王 蒙:追念任继愈先生	294
李锦绣:最后的“宝台山子” ——怀念任又之先生	296
刘天寿:深切的怀念 ——由任继愈先生逝世所想起的	306
黄 松:重温任继愈先生教诲	319
柴剑虹:圆满与遗憾 ——悼念任继愈先生	323
张曼菱:人淡如菊是吾师	327
定宜庄:追忆任继愈先生二三琐事	339
单嘉筠:来自“小朋友”的怀念 ——忆十年来任继愈伯伯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344

助 手 篇

刘 苏:由衷的敬仰 永久的怀念 ——我们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349
李 劲:无尽的怀念 ——追思任继愈先生	350
王 曦:如坐春风 ——追忆任继愈先生	355
杨素香:任先生没有走	359
欧阳美琴:与爷爷一起生活的七年	365

亲 属 篇

任 远、任 重:永远珍藏的记忆	372
任继周:童心、朴实、宽容、进取 ——怀念继愈二哥	386
任 佶:但问耕耘 不问收获 ——记我的伯父任继愈	397
任 海:我的伯父	401
后 记	405

深切怀念任继愈同志(代序)

汝 信

任继愈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哲人已逝,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天我常在想,这位杰出的人文学者除了其著作等身的丰硕的学术成果之外,究竟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什么?

任继愈同志的治学和为人,都堪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楷模。他的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平易近人和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大家对他的钦慕和敬重,学界同仁都习惯于尊称他为任公。我虽无缘直接受教于任公,但一直把他当作尊敬的老师和前辈。上世纪50年代,我自抗美援朝回国由部队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后来投考到哲学研究所贺麟先生门下当研究生攻读西方哲学史。过去我没有受过哲学专门训练,贺先生要我注意补课打基础,他本人学贯中西,强调研究西方哲学也应具备一定的中国哲学史知识,他要我读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就是任公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解放前任公曾是贺先生的学生和助手,深受器重,任公的治学态度尤其得到贺先生高度赞扬,要我们以任公为榜样扎扎实实地做学问。1959年,毛主席召见任公,高度评价他对佛教的研究。1963年,又在一个批示中称之为“凤毛麟角”,并十分强调研究宗教的重要性。随即对任公委以重任,要他负责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任公也就调入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我们这些在学部工作的年轻一代研究人员都认真研读任公的著作,从中获取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启示。他的《中国哲学史》和《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我当时自学我国传统哲学知识的主要读物。

我对任公虽然仰慕已久,但与他相识却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去“五七”干校的时候了。在干校,任公的宗教所和我们哲学所属于不同的连队,只是在开会的场合有机会见面。任公在干校里的表现也堪称模范,虽身处逆境,年逾半百,仍以学习认真、劳动积极而屡受表扬。但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终于损害了他的健康,患严重的视网膜脱落而有失明的危险,不得不回京治疗。林彪阴谋集团被粉碎后,我们干校奉调回京,哲学社会科

学部开始有了恢复研究工作的希望。任公接受任务组成写作班子编写《中国哲学史简编》，他指名要调我参加该组，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因为编写组其他成员都是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并卓有成就的专家，只有我一人是这领域内的地道的“外行”。他找我谈话说明调我的理由，说他读过我的一些文章，有意要找一个搞西方哲学的参加编写组，这样或许可以开拓视界，跳出过去研究中国哲学史多年形成的窠臼。在编写组内，我是边学边干的新兵，任公要我认真研读老子、韩非，并在交谈中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对老子的解读与众不同，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发人深思。他对韩非学说也有全面、客观和深刻的评价。当时正值“四人帮”掀起批儒评法的恶浪，形而上学猖獗，借批孔之名指桑骂槐，把法家捧上了天。任公则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韩非思想作具体分析，他对韩非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以及社会进化思想基本上是肯定的，而对其鼓吹封建专制和统治权术的政治思想则主张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并肃清其两千年来对中国政治的危害和流毒。他说，有人套用哲学唯物主义等于政治上进步这个机械的公式去评价哲学史上的人物，这是完全要不得的，还是要坚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才行。最使他深恶痛绝的是“文革”中盛行一时的“影射史学”，他认为这种恶劣的学风不仅败坏史德，也毒化了政治。后来他又要我认真地研究《红楼梦》一书中的哲学思想，他说《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这么大，研究红学的著作那么多，可是它所传达的哲学思想究竟是什么，今天怎么看，并没有搞清楚。他认为将来写中国哲学史应该专写一章讲《红楼梦》。他的这些谈话对我都是极有启发性的，惭愧的是，我没有完成他所交付的任务。本来我打算在任公指导下好好地补课，搞一点中国哲学史研究，但事与愿违，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哲学所重新恢复研究工作，我又回到了原先西方哲学的研究岗位，不过我在任公直接领导下参加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短暂经历却令人难忘，构成我珍贵的回忆。任公留给我的最突出的印象是他的学者风范，朴实无华，平等待人，毫无学术权威的架子。他对后辈热情培养，不拘一格，诲人不倦。在学术上他充分发扬民主，鼓励独立思考，尊重不同意见，在他面前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同时他又有很强的原则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思想史，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去分析和解释意识形态领域内种种复杂的现象。

任公在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贡献最多，在他逝世后的讣告中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对于一位学者来说，这是极高的评价，比什么“大师”之类的虚衔要珍贵得多。我国研究宗教的学者不少，他们关于宗教的著作有些颇有学术价值，但是像任公那样自觉地、创造性地运

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研究中国宗教并取得丰硕成果的，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凤毛麟角”。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世界上各主要宗教为对象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终于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宗教研究机构，并完成了许多重大研究课题，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文献资料。所有这些业绩都是和任公长期锲而不舍开拓宗教研究的努力分不开的，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个人研究宗教的著作，从上世纪 50—60 年代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到后来他主编的鸿篇巨制《中国佛教史》（多卷本），可以称得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佛教的扛鼎之作。他不是孤立地去研究中国佛教，而是紧密地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出发，去探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佛教中国化和形成自己的各个宗派的过程，对这种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成长而又为基础服务的意识形态形式，进行深刻和具体的分析，从而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对中国佛教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作用和影响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阐明。这一学术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任公的学术研究著作的一大特点是以极其丰富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依据，言必有据，不说空话。以中国佛教研究来说，他亲自动手参加文献的收集整理，主持典籍浩瀚的《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在这一浩大工程中倾注了大量精力。他的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确实是我国年轻一代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表率。恩格斯曾告诫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他批评有人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以为只要把它贴到这种事物上去，问题就解决了。他谆谆教导青年们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我以为任公是真正做到了恩格斯提出的要求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任公作为对宗教有精深研究的大学者，同时也是科学无神论的热情的宣传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必然是无所畏惧的无神论者。正因为他对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更增强了他对科学无神论的坚定信念。长期以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1978 年他创建中国无神论学会，并一直担任理事长主持学会的工作。他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我国

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针对目前现实的思想状况,他竭力主张加强无神论教育。他曾这样写道:“科学无神论,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天然的结合点。为什么有人迷信鬼神?因为人们对某些现象(社会的、自然的)不理解,无能为力,对自己失去信心,才去找外人帮助。科学无神论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告诉人们,鬼神是不存在的,人类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有所作为。就像《国际歌》中说的,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神仙皇帝。”他就是这样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的内在联系。有一次任公和我谈及宗教问题,他说我们学术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本人研究什么就有意加以抬高和吹捧,研究宗教就把宗教吹得天花乱坠,甚至成为宗教信徒。这是最要不得的,因为这样就不可能真正客观地、科学地去评价研究对象,更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进行剖析了。我一直牢记他的教诲,去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论文集,在“前言”中说,“我所尊敬的一位研究宗教的学界前辈曾经告诫说,要把宗教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而绝不要因此成为信仰宗教的信徒”,这里说的那位学界前辈就是我所敬仰的任公。我认为,他指明了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宗教应抱的正确态度,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思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

北大学友、学生篇

由衷的敬仰 永久的怀念

——我们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黄枏森 刘 苏

我们夫妇和任继愈先生一家的交往几乎与共和国同岁,已有60余年了。不仅任先生与黄枏森是亦师亦友,两家人之间也有着深厚的友谊。

黄枏森与任先生相识于西南联大,任先生比黄枏森长5岁,但1943年黄枏森从西南联大物理系转到哲学系读二年级时,任先生已是西南联大哲学系讲师了,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全国解放后,两人又一起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后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共事,任先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与教学,黄枏森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直到宗教研究所完全划归中国科学院后,任先生才离开北京大学,但后来两人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宗教学科建设方面,仍有许多合作。

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从沙滩搬到燕园,两家同住中关园,两幢平房间虽然隔着一条小河沟,但仍可以说是比邻而居。两家大人常来常往,年龄相仿的孩子也是童年玩伴。自上世纪70年代起,刘苏开始协助任先生工作,直到1988年61岁离休,刘苏为任先生当了15年的学术工作助手,工作地点就在任先生家里,工作之余,她常常与任先生的夫人冯锺芸教授轻声慢语地闲叙家常。特别是这几十年间,任先生夫妇还在生活上给予了我们许多关怀照顾。

最近这20年,任先生年事渐高,但他只要到北大附近开会,都要绕道来我们家坐坐,聊些家常。无论春夏秋冬,他始终是西装笔挺、姿态娴雅。任先生那面带微笑、风趣幽默、可亲可敬的形象,是我们永远的记忆。

记得2006年,是任先生90岁寿辰之年。任先生的同事和学生们提议为他隆重庆祝90华诞,但是任先生坚决谢绝了。为了表达心意,黄枏森和刘苏决定书写一幅条幅送给任先生。我们挑选了王维的五言诗《过香积寺》,借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安禅制毒龙”,来比喻任先生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佛学研究,并与邪教作坚决斗争的学术品德;由刘苏以墨笔行书精心写成条幅,装裱好送到任先生家,表示祝福。任先生一向喜欢刘苏的书法,当即把条幅挂在了客厅迎门处。

令我们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任先生亲自来到我们家,回赠了我们一幅他亲书写的墨笔条幅。他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诗云:“互为师友不记年,山城弦诵忆南天。劫火余生伤病目,竹窗红袖缀残编。”诗后题辞云:“枏森导我学新哲学刘苏助我抄书稿整录音数十年来共经风雨为诗志感任继愈。”他用短短28个字概括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第一句明显过谦,但“共经风雨”一词却十分贴切,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北平解放时,任先生已是一位颇有学术造诣的中国哲学史青年学者。他服膺真理,崇尚科学。当大学之门一旦向马克思主义思想敞开,他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且不久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他的专业研究。1956年,任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枏森有幸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54年,《光明日报》创办《哲学》专刊,任先生负责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编辑工作,黄枏森是专刊两任主编金岳霖先生和郑昕先生的主要助手,刘苏则负责专刊的事务性工作。在这几年里,我们和任先生经常接触,工作上合作得也很愉快。由于冯鍾芸是北大中文系教师,刘苏也很喜爱中国文学,工作上的密切接触加上爱好相同,两家生活上的交往也日渐亲密。任先生夫妇在我们心目中是纯粹的学者和忠厚的长者,赢得了我们真诚的尊敬。

《哲学》专刊停办,是在1958年。那年哲学系“开门办学”,师生都下放到北京市大兴县,国家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其后不久,黄枏森遭遇政治风暴袭击,离开北大讲台。刘苏由于受到牵连,被单位无端退职。任先生则由于在佛教思想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重视,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奉命创办宗教研究所。1964年,宗教所完全划归中国科学院,他作为所长,也自然就离开北大了。

任先生的工作由于得到毛主席的重视,所以在“文革”开始后,“左派”没有把他列入应“打倒”之列。但不知为什么,江青看他不顺眼,使得他无端受到《红旗》杂志刊文批判。“文革”对于我们来说是雪上加霜,任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听说他由于在下放劳动时干重体力活,导致双眼视网膜脱落,当

时只有上海有相应的治疗条件，但辗转到达上海后，最佳治疗时机已经失去，仅有一只眼睛恢复了部分视力，另一只眼却永久失明了。

听说任先生从上海治病回来，我们一起去他家看望他。他告诉我们，为巩固疗效，医生禁止他用眼。他问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刘苏能不能每天抽点时间给他读读书报。赋闲在家的刘苏当然没有不应允之理，只是没想到，刘苏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助手工作。

这件事表面看起来是我们在帮助任先生，其实同时也是任先生在帮助我们。自从60年代初刘苏退職后，全家老少6口的生活来源全靠黄枬森一人的工资维持，而且家人病患不断，经济上颇为紧张，那时任先生就曾主动帮助过我们。那个时代自行车是家庭的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相对于工资来说，价格也相当昂贵。任先生看到我们家只有一辆自行车，刘苏患病出行很不方便，便主动借给我们150元钱，并表示不必急着还钱。而这笔钱，比黄枬森的月工资还多。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一辆二手女车，直到十多年后才逐渐还清。这次刘苏担任他的助手，先是由所里按临时工支付一定工资，虽然不多，但已经帮了我们大忙。后来任先生承受着来自江青的巨大政治压迫，研究所撤销了为他聘请助手的名额，刘苏的工作仍未中断，只是工作时间减半，这半天的工资就由任先生从个人收入里支付。直到“文革”结束，进入80年代，在任先生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社科院和宗教所的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刘苏才逐渐落实政策，先是恢复了正式的国家干部身份，然后是经过多方努力，接续了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工作资历，最终得以享受离休待遇。

这15年来，刘苏的工作成为了任先生的眼睛，工作内容逐渐由读书读报发展成为全面的学术工作助手，如查找并抄写学术资料卡片、记录整理口述文章和讲课录音、代笔往来信件、为他的学术巨著编写索引，等等。

不难看出，虽然刘苏作为任先生的助手也做了许多工作，有一定成绩，但任先生对刘苏的帮助更是巨大。对此，刘苏深深铭感于心。

任先生对北京大学宗教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创建之功，也是值得永远记住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任先生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哲学评议组召集人，黄枬森是评议组成员之一。此时黄枬森已获得平反，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会议期间，任先生对黄枬森说，宗教所尽管已经获得宗教学博士点资格，为国家培养有专业训练的宗教学工作干部和研究人员，但是生源是个问题。他提出建议，在北大哲学系设立宗教学教研室，招收宗教学专业本科生，宗教所可以派研究人员来哲学系担任教研室主任，讲授宗教学课程。当时全国普通高校还没有一所招收宗教学专业本科生。

任先生的这个建议得到北大哲学系的支持和校领导、国家教委的批准,于1983年开始招生。任先生先是派谢雨春研究员来担任教研室主任,谢病倒后改由乐峰研究员接替。宗教学方面的课程大部分由宗教所派研究人员讲授,任先生也亲自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宗教所的同志在北大哲学系宗教学专业讲课和担任职务都是义务性的,没有一分钱报酬,连交通费也是回宗教所报销。任先生和宗教所同志们的这种只讲奉献不图索取的精神获得了北大哲学系师生的真诚感谢与敬佩。经过数年的过渡,北大自身的教学力量逐渐成长,最后才由北大教师担负起全部工作。今天,哲学系宗教学专业已经发展为北京大学宗教系。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任先生和宗教所的同志们对北大宗教学教学工作的开创之功将永远铭刻在北大宗教系的历史上。

回忆起任先生作为合作方的负责人,为共同办好宗教学专业不辞辛劳、千方百计设法解决各种不断出现的困难的情景,黄枏森至今仍深深为之感动。

任先生在我们心目中,是循循善诱的师长,又是助人为乐的挚友。他给我们留下的是由衷的敬仰和永久的怀念。

作者黄枏森为北京大学教授
刘苏为《光明日报》离休干部

略论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唯物史观

张岂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这是重要的历史课题,需要加以研究。本文拟探讨任继愈先生(1916.4.15—2009.7.11)学术研究的唯物史观特色,向读者朋友们请教。

一、任先生对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任先生与侯外庐先生(1903.2.6—1987.9.14)健在时,由于各忙各的工作,很少直接交谈,只是在有关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见面,有过短时间的交流。1957 年至 1960 年外庐先生主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著工作,隋唐佛学部分写成后,外庐先生叮嘱:“此稿一定请任继愈先生审阅,他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任先生看了稿件后,评价很好,但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外庐先生很高兴,要他的助手杨超同志(这一部分的文字起稿者)按照任先生的意见进行修改。任先生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史及宗教史的,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他说:“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 1956 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①

2003 年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西北大学为纪念这位老校长和著名历史学家,在百年校庆(2002 年)的金秋十月,举办了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

^①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是任先生在 1988 年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稿,详见任继愈著《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 523—536 页。

讨会。西北大学特别邀请任继愈先生光临指导。2002年10月13日上午,在西安止园饭店举行学术研讨,我主持大会发言。第一位发言的就是尊敬的任继愈先生,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①。他一身深蓝色西服,系蓝灰色领带,温文尔雅,庄严而不矜持。因为对外庐先生学术研究很了解,并作了长时间的思考,任先生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言辞自然恳切,引人入胜。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一开始便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的时代思潮。马克思主义方法是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一种崭新的工具。以前国内没有,它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用在政治上就引起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潮。……马克思影响新中国,靠的是他的学说的真理性,靠的是辩证法。这用在史学上作用也很明显,自从有了唯物史观这一观察社会的新的工具,史学(研究)面貌就大不一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出现了一批改变了中国历史学术的杰出人物。……^②

任先生认为,侯外庐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他创立了一个学派,关于这个学派,任先生做出这样的评价:“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文化的整体、社会的整体看问题,而不是孤零零地看一个问题,从整体、全局看局部,跟站在局部看局部不一样。”^③在任先生看来,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从社会史入手进行思想史研究,这二者相结合,就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任先生还指出,这样的贡献不是偶然的,“侯外庐先生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马恩著作下过功夫,他是从源头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早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学术优势是从第一手原著入手,他所受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

①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0—24页。

② 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页。

③ 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22页。